

中国外语知名学者文库

翻译论稿

刘重德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中国外语知名学者文库

翻译论稿

刘重德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论稿/刘重德著.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9

(中国外语知名学者文库)

ISBN 978-7-04-023097-0

I. 翻… II. 刘… III. 翻译—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9718 号

策划编辑 贾 巍

责任编辑 王 丽

封面设计 刘晓翔

版式设计 孙 伟

责任校对 王 丽

责任印制 尤 静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总 机 010-58581000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

字 数 350 000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3097-00



■刘重德，1914年出生，1934年就读于北大。从事教育工作、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60余年。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剑桥国际传记中的名誉顾问。湖南省译协名誉会长，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译协名誉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名誉会长，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学术顾问，“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主任委员之一。其翻译方法论主张“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直意结合，灵活运用”。

郑重声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未经许可的复制、销售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行为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避免读者误用盗版书造成不良后果，我社将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严厉打击。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侵权行为，希望及时举报，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反盗版举报电话：(010) 58581897/58581896/58581879

传 真：(010) 82086060

E - mail: dd@hep.com.cn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打击盗版办公室

邮 编：100011

购书请拨打电话：(010)58581118

博观约取，借鉴创新，厚重朴实，垂范学林

——《翻译论稿》前言

刘重德先生论文自选集《翻译论稿》即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外语学者文库”出版，受刘老和师母的嘱托，为书稿作些校阅、整理工作并为书撰写前言。作为晚辈和学生，能为凝聚先生一生研究成果精华的大作尽绵薄之力，使我倍感荣幸，但另一方面又深感责任重大，惟恐力有不逮，有负先生的重托。

先生1914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一个偏僻的乡村，幼读私塾，熟诵四书五经。1931年考入开封高中文科，1934年在河南全省高中毕业首届会考中获第一名，同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外文系。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对他的入学考试成绩表示赞许，鼓励他再接再厉，争取优异成绩。在北大期间，受教于梁实秋、朱光潜、叶公超、潘家洵、钱穆等著名学者。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先生随学校辗转南下，先在长沙临时大学，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其文法学院在云南蒙自）度过了最后一段学习生涯。西南联大名师荟萃，先生从英国诗人、批评家燕卜苏修莎士比亚，从语文学家和音韵学家罗常培修语音，从哲学家冯友兰修中国哲学史，从红学家、诗人吴宓修西洋文学史，从著名学者、诗人柳无忌修英国戏剧。身居学府，亲炙名师，再以先生的聪颖和勤奋，广泛涉猎中西学问，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先生历任中央大学讲师，河南大学、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此外，先生还担任过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社联名誉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湖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名誉会长。1991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证书。其事迹和成就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和美国传记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名人录以及《中国翻译家词典》所记载。

先生一生笔耕不辍，年过古稀之年以后依然文思敏捷，成果迭出。诸如《翻译漫谈》（1984）、《文学翻译十讲》（1991）、《汉英四书》（校注）（1992）、《爱玛》（重译本）（1993）、《浑金璞玉集》（1994）、《癡君子自白》（英汉对照版）（2000）、《德·昆西经典散文选》（译著）（2000）、《西方译论研究》（2003），以及大型翻译工具书《英汉翻译例句词典》（主编）（1999），都是七十岁以后完成的。足见先生学术精力之旺盛，追求之执着，著译之勤奋，确非一般人可比。

这里想特别一提的是由先生主编、38人（其中教授和译审19人）参编、耗时七载编成的394万字的《英汉翻译例句词典》，更是先生以八十高龄策划和主持的一项浩大而复杂的工程。该《词典》收词目1万余，例句5万余单元。全部例句选自1千种英文原著（作），其作者大多是英国和美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如培根、莎士比亚、狄更斯、萨克雷、奥斯丁、勃朗特姐妹、康拉德、乔伊斯、欧文、霍桑、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海明威、福克纳、奥尼尔等，也有富兰克林、亨利·亚当斯、邱吉尔、约翰·肯尼迪、吉米·卡特、罗素、赫胥黎、霍金等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例句的译文，有的出自包括胡适、梁实秋、朱生豪、吕叔湘、楚图南、张谷若、王佐良、杨必、张友松、万紫等在内的一批名家的手笔，有的是译界新人的妙手偶得，有的则是编者揣摩原文、匠心独运的译笔。先生从项目的策划，编写宗旨、原则的确定，编写人员的联系，直到每一个词目、例句的遴选和修改，都亲自动手或组织大家一起干。笔者作为《词典》的执行副主编，目睹了先生逐张审阅成箱的、数以万计的卡片（每个初选例句一张卡片），并对入选的例句作必要的修改，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以实际行动恪守自己“不当挂名主编”的信条。

先生治学，历来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和许多老一辈的翻译家一样，刘老是从翻译实践开始的，他的翻译理论研究是建立在长期丰富的翻译实践的基础之上的。早在1944年先生在中央大学担任讲师时，就着手翻译英国小说家奥斯丁的小说《爱玛》，该译本1949年由重庆正风出版社出版，是这部文学名著的第一个中译本。在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翻译生涯中，先生陆续翻译了《老马和小马》（合译）、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缩写本）、盖斯特的《寻常人家》、斯坦贝克的《小红马》、黑兹利特的《莎士比亚戏剧人物选》、德·昆西的《癡君子自白》、《汉英对照千家诗》（主要译者之一）、《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德·昆西经典散文选》等。

刘老译书，一如他做学问，求真务实，一丝不苟，要求自己“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对于选词造句，要有像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贾岛‘两句三日得’和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那样推敲琢磨、一字不苟的精神，力求使译文不仅达意，而且传神，以保存原作的‘丰姿’和风格。”（《翻译原则再议》）在动手翻译之前，一定反复阅读、吃透原文，然后字斟句酌，力求表达准确、通顺。绝不像少数译者和出版者一样，受条件的限制和利益的驱使，置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于不顾，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推出错误百出（但有时文字还很流畅，颇有“可读性”）的译本，糊弄国人（如果是汉译外就是糊弄洋人），欺负读者不懂或者没有机会阅读原文。理解原文是翻译的第一步，就外译汉而言，也许是更重要、更困难的一步。所谓“搞翻译我外语理解还可以，汉语表达不行”，后一句话也许说的是实际情况，前一句话却未必是真。

实际上，外译汉中的错误和问题，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与理解不正确或不到位有关。因为许多理解问题远不是单靠查字典就能解决的。当然这里不是指比较浅近的原文，而是指内容和语言都有一定深度和难度的学术著作或文学作品。“凡是对原文理解够的，译文纵使别扭些、冗长些，改动起来并不困难；反之，如果对原文并不真正理解，即使译文很流畅，改动起来仍旧感觉吃力；如果理解得不够还要望文生义，来点加油加酱，那就更加没有办法，只好涂掉重来了。”（周煦良：《翻译与理解》）刘老治译，深知理解原文的重要，除了反复阅读原文文本之外，还不惮辛劳，阅读有关作者的其他著作，以加深对文本的理解。例如湖南人民出版社约请刘老翻译达尔文评传，他以不熟悉达尔文学说而婉辞，后推辞不掉，他竟然以古稀高龄钻研起达尔文来，借来两本介绍达尔文和遗传学说的书，认真读完之后才着手翻译，定稿之前又专门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于所译书中的术语，还请一位生物学专家一一审订。这件事一方面反映先生治译的严谨，另一方面也说明先生深知译事的艰难，从不掉以轻心。因此先生的译著能忠实地反映原作的内容和风格，形神兼备。例如所译奥斯丁小说《爱玛》就受到我国外语界前辈罗昶岚教授和吴景荣教授的高度评价，认为“译文畅达，颇能传达原著精神”。所译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散文大家德·昆西的名作《瘾君子自白》，成功地再现了原作那种智者絮谈式的有时又颇为诗化的语言风格。

先生在广泛从事翻译实践的同时，潜心翻译理论研究。不但研究中国传统译论，也注重介绍和研究西方译论。他先后在《翻译通讯》、《外国语》、《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外语与外语教学》、《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有关翻译的论文数十篇，内容涉及翻译的性质、翻译的原则、直译与意译、文学风格的翻译、诗歌的翻译、翻译评论、翻译教学等，其中《试论翻译的原则》、《翻译原则再议》、《论文学风格的可译性》（英文）、《论直译与意译》（英文）、《译诗问题初探》等文章已成为论译的名篇，其中的观点与论述经常被人们所引用。另外，他还出版了《翻译漫谈》、《文学翻译十讲》（英文）、《浑金璞玉集》、《西方译论研究》等4部翻译理论著作。

先生研究中西译论，既虚心学习各家各派的长处，吸取其精华，又善于独立思考，避免盲从。因此所论对于前人的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例如关于翻译的定义，他根据翻译、语言、文化三者的关系，将传统的定义修订为：“翻译者，相关两种语言之转换与其所蕴含的文化之移接也。”（《从翻译的定义谈起》）关于翻译的性质，他提出：“翻译不仅是一门有着自己的规律和方法的科学，也是一门再现和再创造的艺术。”（《文学翻译十讲》）关于翻译的原则，先生在1979年就提出了“信、达、切”的主张，即“信于内容，达如其分，切合风格。”（《试论翻译的原则》）以后他又在不同场合重申和进一步阐明这一原则：“信于内容的‘信’，即严复所谓意义‘不悖原文’，亦即

泰特勒所谓‘翻译应该是原著思想内容的完整的再现’。作者在原文中所表达的是个什么意思，译者在译文中也应该译个什么意思，不可凭个人的好恶，或牵强附会，或截长补短……即使是所谓‘编译’或‘评述’，严格说来，也不能违背原文的中心意义，只不过是‘不斤斤于字比句次’、‘前后引衬，以显其意’罢了。”“有了信于内容的‘信’，达如其分的‘达’，便是第二个最重要的原则了。译者翻译文章或书籍的目的，当然是让人家阅读的，译文如果结里结巴，使人看了不知所云，那就失去了翻译的意义。正如严复所说，‘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同时，在通顺的基础上，表达的深浅也应力求与原文一致。”“译者在达到既忠实、又通顺的程度之后，如前所述，才可以进一步探求风格的‘切合’。我之所以不采用严复所讲的‘雅’字，而改用‘切’字，是因为‘雅’即所谓‘尔雅’或‘文雅’，而‘雅’只不过是风格中的一种。因此，翻译起来，不能一律要‘雅’，应该实事求是，酌情处理，恰如其分，切合原文风格。‘切’是个中性词，适用于各种不同的风格。”（《翻译原则再议》）以上解释说明“信达切”的原则，对严复和泰特勒的翻译标准，既有承袭，又有创新，证明刘老对传统译论，无论中西，都是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以“切”代“雅”，并不是故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基于翻译活动的性质与要求和中外翻译实践的事实，实事求是提出的主张，而“切”字则表明先生对于翻译必须传译原文风格的重视。诚如一位学者所言，“一个‘切’字，绝不是妙手偶得，也不是神来之笔，貌似容易实则难，它是刘先生长期以来，潜心译论，惨淡经营的结晶。”（冯颖钦：《继承·借鉴·实践——刘重德翻译理论蠡测三题》）。

关于文学风格的翻译，先生一直非常重视，特别是提出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去进行考察的主张。他说：“我认为，要想满意地再现原作的风格，我们在着手翻译之前必须具备两个观点。首先应该有宏观的观点即文学观点。译者应该时刻记住他所译的是别人所写的一部文学著作，因而力求将它译成一件与原作思想、感情和风格一致的艺术品。这样，译文就会和原作一样生动，一样感人，而读者也能得到美的享受。其次要有微观的观点即语言学观点。……从语言学的观点来看，风格就是由段落、句子、单词的恰当组合构成的。”（《论文学风格的可译性》）从语言学的观点看，风格就是语言选择，离开了语言要素，就无所谓风格。笔者曾就此发表过一点看法：“风格的各种物质构成要素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现在作品中的风格就是风格诸要素的总和。译者只要仔细分辨这些要素，研究其特点，并在译文中予以充分的恰当的反映，原文的风格就会悄然融入译文，使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一样受到感染。”（蒋坚松：《古籍翻译中表达的若干问题》）这里说的“风格的各种物质构成要素”实际上就是语言要素，也就是作者或译者对原文或译文在语音、词汇、句型、语篇诸方面特征的选择和使用，这些语言要素无疑是风格构成的物质基

础。但是笔者也认为文学作品的风格还有另一方面，即文学作品的整体美学效果，它基本上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而且因人而异，是无法完全按语言学或文体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的。这时译者往往无法一对一地进行转换，而“必须斟酌上下文，且依赖他敏锐的直觉”。（余光中：《翻译与创作》）比如《菜根谭》这部中国古代格言录中许多地方有着中国古代诗文的朦胧美。与这种诗意的朦胧密切相关的是语言的模糊。因此必要时“以模糊对模糊，以朦胧出朦胧，也不失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明白和确定……在特定的上下文中，这种模糊和精确一样，同样是对文本的正确阐释。”（蒋坚松：《古籍翻译中理解的若干问题》）刘老从宏观和微观即文学和语言学两个方面去考察文学风格的翻译，既避免了忽视构成风格的语言要素，单凭主观感受去传达原作风格而失于粗略乃至出现偏离，又避免了见木不见林，只注意语言要素，忘记了文学作品是一个完整的审美客体，其阅读是一次完整的、复杂的美感经历，忽视了作品的整体美学效果。这说明翻译过程中的文体分析和文体产出都必须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进行，前者从宏观体验和把握到微观分析，后者从微观再现到宏观评价和调整，两者结合，译文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切近原文的风格。先生所论切中要害，充满辩证法，令人信服。

关于诗歌翻译，先生所论亦语多精辟。有人认为诗不但不可译，而且不可解释。一经翻译或解释，就诗味尽失，不再是诗。（Robert Frost: “Poetry is what is lost in translation. It is also what is lost in interpretation.”）对此，刘老的观点是：“诗可译，但难译。”说它可译是“因为第一，人互相之间存在着大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有灵犀一点通。诗可理解；诗可欣赏；诗可互译。第二，大量的历史事实已充分证明这种可译性。世界上著名诗人，如英国的莎士比亚、弥尔顿、雪莱、拜伦，美国的朗费罗、惠特曼，法国的雨果，德国的歌德，俄国的普希金以及印度的泰戈尔等，早就有译文可读，而且很多是译得很好的。各国现当代的优秀诗篇，也有不少译了过来。拿中国的唐诗说，早就有了外国文字的译本。”说它难译，“首先是各民族的大同中还存在着不少小异，除开语言文字本身在特点上的差异外，还有局部生态环境的差异，社会风俗习惯的差异，文化背景的差异等等。其次是诗最讲求文字的精炼，意境的清新，风格的鲜明，换句话说，即讲求形音意三美。要想再现原诗的风格，毋庸讳言，本是不易。”关于译诗的原则，刘老认为有二：“第一，原诗是一种形神兼备的艺术品，译诗也必须是一件形神兼备的艺术品，保持诗的艺术性，形音意三美均须追求；第二，既然是译诗，不是创作，‘忠于原作’，理所当然。所谓忠于原作，根据我的意见，就是译诗应传原诗的情绪，应传原诗的内容，应取原诗的形式。只有符合这两条要求的译诗，才算是理想的译诗。”如何用“信、达、切”的原则指导诗歌翻译？刘老认为：“就译诗说，信于内容，就是要保持原诗的意义和意境。达如其分，是就原诗

文字表达的深浅程度来说的。假如原诗行文浅易，译文在文字表达上亦应力求浅易；假若原诗行文艰深，译文亦应力求艰深。原诗风格，多种多样，有通俗与典雅之分，有质朴与华丽之分，有庄严与诙谐之分等等。译诗的风格应力求切合，至少接近原诗的风格。”（《译诗问题初探》）

有人认为，唯诗人才能译诗（It takes a poet to translate poetry.）这种说法虽然有些绝对，但是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诗人译诗，小说家译小说是最理想的，也是最容易成功的。古今中外，大凡走这条道路的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李瑞华：《〈浑金璞玉集〉跋》）因为有了诗歌创作的实践，有了诗人的形象思维、意境和灵感，就更容易理解和欣赏别人写的诗，更容易对其中的思想和感情产生共鸣，也更容易用译语中诗的语言和形式去表达。刘老译诗也写诗。早在西南联大时，就在诗人闻一多先生的指导下，和十余位爱好新诗的青年成立了南湖诗社，成员中有后来成为知名诗人的著有《穆旦诗选》、译有《拜伦抒情诗选》的查良铮（笔名穆旦）等人。从1934年到1944年十年间，先生写过不少新诗，保留下来的有47首，其中有15首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分别发表在《文艺先锋》、《文林》等刊物上。先生曾以刘一士的笔名写了一首讽刺时政的诗《太平在咖啡馆里》，被同学传诵一时：

太平在咖啡馆里

太平在咖啡馆里！

谁说

中国充满了炮声？

充满了呻吟？

充满了血腥？

看——

南湖鸬鹚鸟

正在痛饮，

徐徐清风

在平静的水面上

划起无数

悠闲的纹。

看——

世外咖啡馆

正在宴会，

谈笑风生，

在酸涩的柠檬里
浸透无数
空白的心。

谁说
中国失去了太平？
失去了舒服？
失去了欢欣？

太平在咖啡馆里！
时隔四十多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先生心情振奋，又一次拿起诗笔，
1988年以“笔”为题写了一首抒情小诗，其最后两节是：

笔啊，
最难堪是那浩劫十年
硬逼你让位于扁担，
你只好在案头蒙尘生锈，
一筹莫展，有苦难言。

笔啊，
欢呼这振兴中华的新时代，
快抖落身上的尘锈，
重露锋芒，
谱写新的历史诗篇！

当时先生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但从这充满激情的诗句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南湖诗社那个关心国运的爱写新诗的文学青年的影子。

有了诗人的才情，又有译诗的见解，译出的诗自然不同一般。试看先生翻译的徐志摩的这首短诗：

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徐志摩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
沙扬娜拉！

Shayangnala*

—— To a Japanese Girl

Xu Zhimo

With that very softness in your bow,
Like the lovely blush of a lily unable to stand the cool breeze.
You did say goodbye. You did say goodbye.
In your voice there was a sweet sadness and sorrow ——
Shayangnala!

* Shayangnala is the transliteration of the poet's 沙扬娜拉 from the Japanese word which means goodbye and whose English spelling is sayonara.

徐志摩是一个情感丰富的性情中人，诗如其人，徐诗有一种梁实秋所称的“直诉诸你的灵府”的“一股不可抗拒的‘媚’”。先生“以自由诗译自由诗的方法，将原诗的意义、意境乃至风格，可谓表达得淋漓尽致，使一位温柔多情、美丽动人的女郎形象跃然纸上，从而令英语读者如同中文读者面对原诗一般，会将译诗反复吟哦而不忍掩卷。”（郑延国：《诗歌翻译的特征、要求、原则和方法——刘重德诗歌翻译观探微》）

对刘老的信达切三原则和其他关于翻译的论述，译界有不少中肯的评论。有的学者指出刘老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他研究翻译标准‘信达雅’，参考严复与泰特勒的观点，通过批判提出了‘信（信于内容）达（达如其分）切（切合风格）’。他研究直译和意译，提出了‘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直意结合，灵活运用’。……研究翻译风格再现问题，他提出‘首先是宏观的文学观点，尽量使译文接近全部原作的神韵风格而达到神似，其次是微观的语言学观点，力求译好字、句、章而达到形式，神形俱似，方臻上乘’”。（杨自俭：《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立德垂范——〈西方译论研究〉序》）有的学者认为：“在译学领域内，刘先生称得上是一位读书万卷博大精深的一代宗师。他对我国古代的译人、译典、译史、译论了了于心，稔如家珍。对我国悠久的译学传统，刘先生是在熟稔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在继承的前提下进行提炼。所谓提炼，就是一分为二地对待译学遗产。既不完全肯定，也不一概否定。而是：其精者，取之，其粗者，弃之；其清者，扬之，其浊者，激之。刘重德先生凭着其独特的眼力和超拔的识见，在弃取激扬之中，做到了继承而不拘泥，师法而有创新。”（冯颖钦：《继承·借鉴·实践——刘重德翻译理论蠡测三题》）还有的学者在对先生和英国翻译理论家 Peter Newmark 的翻译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指出：“刘重德和 Newmark 都注意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及理论思考予以创造性的发挥。刘

重德的翻译理论既继承中国传统译论中丰厚的哲学及美学底蕴，又吸收了西方现代译论对语言的精密分析。这种结合融翻译过程的人文性与科学性于一体，更趋近于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信达切’三原则集中体现了他对严复的‘信达雅’理论和泰特勒‘翻译三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此外，他对直译与意译关系的全面认识是受鲁迅的影响。他认为风格是对审美客体整体的认识而非对个别语言层面的分析，这一观点的形成受到了19世纪英国著名诗人及评论家 Matthew Arnold 的启发。他也接受了奈达从语言的共核及文化的通约性的角度论证语言可译性的观点。刘重德在将古今中外优秀译论兼容并蓄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独特的理论系统。”（陈宏薇 苏艳：《一致性：刘重德与 Peter Newmark 翻译理论之比较研究》）以上评论，一致指出了先生在丰富的翻译实践的基础上，融通古今中外译论，撷取文艺学和语言学的精华，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发展建立自己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朴实无华但切实有用的翻译理论。

先生的文章朴实，厚重，兼容并蓄，客观公允，文字不事雕饰，唯求准确达意。说明先生为文一如其做人，“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文中也许没有许多时髦的术语和深奥的理论，但充满一生辛苦耕耘积累的智慧与卓见和激发的灵感与诗人的才情。见文如见人，这就是几十年来我所知道的先生：勤勉，严谨，厚道，宽容，为人重德，治学求真，以道德文章感人服人。相信读了《翻译论稿》的人，不但会佩服先生卓越的学术思想和识见，也会感受到他崇高的学术品格和人品。

蒋坚松

2007年2月

谨识于湖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 [1] 蒋坚松 彭利元. 刘重德翻译思想及其他[C].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2] 刘超先 蔡平. 寒窗草——刘重德诗文选集[C].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3] 刘重德. 翻译漫谈[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 [4] 刘重德. 文学翻译十讲[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1.
- [5] 刘重德. 浑金璞玉集[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4.
- [6] 刘重德. 西方译论研究[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
- [7]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 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A Brief Account of the Author's Life

Liu Zhongde, the author of this volume, was born in an out-of-the-way and backward village in Huaxian county, Henan Province, 70 li north of the Yellow River. His village consisted of more than 100 families, but there was not even a single primary school. Therefore, it was not easy for the youngsters to go to school. All of his family were illiterate and often got cheated. Then he was determined to study on his own.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when every house would put up antithetical couplets on both sides of the door, he would ask his neighbours to teach him the characters on them.

When he was seven years old, an old-style private school was established in the village and a scholar named Ning was engaged as the teacher. Liu was enrolled as one of the pupils. He was able to recite *The Four Books and The Five Classics* fluently within three years besides learning the three primers including *The Three-Charactered Classic*, because he was highly conscious in his study. He recited so quickly and read so many books in so short a time that he became well-known to all the neighbourhood.

In the summer when he was ten years of age, a teacher named Fu took him to take part in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the first primary school in Huaxian city and he barely qualified for admission. However, not long after he entered the school, he got A's in all subjects except drawing, handicraft and music. He came out first in his class in the end-of-term examination.

He returned home when he finished the primary school. Now he was already so good at writing and reckoning that his parents felt quite satisfied and wouldn't let him go to school any longer. Not until he was fourteen years of age were his parents persuaded by their co-villager Mr. Zhang Peidao to agree that Zhang's friend might take their son to the Zhongzhou Middle School. At the end-of-term examination, he won the first place in his class. And after the summer vacation, he was permitted to skip a grade by the dean of students. He entered himself for the examination of the Kaifeng Senior Middle School and came out third among all the applicants and was assigned to study in Class A of the liberal arts department. He gained a scholarship every term owing to his outstanding school work and excellent conduct. Attracted by a few short lyrics by 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 he translated them into Chinese. His translation was recommended to the school journal by his English teacher. Although their publication was not worth mentioning, it strengthened his determination to enter himself for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the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Henan Province held the first joint examination of all the senior school graduates when he was graduated. He took it and won the first place of class A. The Henan provincial newspaper reported this news. He entered Beida (Peking University) in 1934. Before long Dr. Hu Shi, the dean of the liberal arts college, called in the freshmen for an interview. When it was Liu's turn, the doctor said to him, "Your marks in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are very good — Chinese 80, English 76, mathematics 60. I hope you will continue to study hard." In 1937 the Lugouqiao incident broke out, and Beiping and Tianjin were occupied by the Japanese invaders. Before their occupation, many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three universities of Beida, Qinghua and Nankai had returned home. With the *Pocket Oxford Dictionary* in his pocket, Liu went back home in a roundabout way taking first the Tianjin-Pukou and then the Lianyungang-Lanzhou railways. Not long after he came back, he encountered the biggest flood in a century. The flood water was seen everywhere. He resolutely and determinedly waded through the water to Kaifeng to make inquiries about Beida. As soon as he arrived i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he heard that Beida, Qinghua and Nankai resolved that they should join to form the National Changsha Temporary University in Hunan. He went to Changsha to register.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was temporarily housed in a bible school at the White Dragon Pool on Mount Nanyue (Mt. Hengshan) and began to resume its lectures on November 1. Nanyue wa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for study, yet the situation would not allow you to enjoy the scenery. The Temporary University had to move to Yunnan to keep training qualified personnel in fighting against the enemy invasion and reconstructing the motherland. The university sent an advance party to Kunming to make preparations in January 1938 and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set out for Yunnan in three groups. The third group, under the name of a wartime organization called the Hunan-Guizhou-Yunnan Traveling Corps, mainly consisted of boy students whose homes were in the war areas or the enemy-occupied ones. Zhang Zhizhong, the Hunan provincial governor, appointed lieutenant general Huang Shiyue, a senator in the government, to be the head of the corps. At the same time the university engaged three professors Zeng Zhaolun, Wen Yiduo and Huang Yusheng as counsellors to the corps. Liu also gladly took part in the march with a view to finishing his last term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members of the corps traveled a total of 3200 li in 68 days, and safely reached the destination on April 28. The university was order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change its name into the National South-Western Associated University with Jiang Menglin, Mei Yiqi and Zhang Boling as the members of standing committee in charge of the school affairs. The colleges of liberal arts and law were arranged to have